

詞典研究叢刊

CIDIAN YANJIU CONGKAN

3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谢临光

封面设计：李文金

词典研究丛刊 (3)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82 千
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300 册

书号：9118·19

定价：0.72 元

目 录

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	徐中舒 (1)
《汉语大字典》为什么还要用旧笔形的繁体字	冉友侨 (6)
甲骨文字的一字多形问题 ——《甲骨文字典》编纂小组工作笔记之一	《甲骨文字典》编纂小组 (10)
编写大型汉语字典要担负起清理文字的责任	程二如 (22)
谈谈《鲁迅大词典》的编纂工作	曾庆瑞 秦 川 (28) 刘兰英
《藏汉大词典》语词部分的若干问题	杨承丕 (45)
一部颇具特色的新字典 ——评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	骆伟里 (57)
《简明古汉语字典》已发稿付排	(61)
思想解放开新花 业余科研结硕果 ——《中国文学家词典》现代第一分册正式出版发行 秦 川	(62)
大型汉语字典中处理复音词的几点意见	高振业 (65)
也谈义项的建立与分合	张静书 (74)
补《说文段注》古音韵的分部 ——“《说文段注》校笺”之一	余行达 (87)
注音札记	黎新第 (95)
关于编写生僻字	贺明元 (109)
字海拾零录	倪文木 (120)
谈谈《俄语教学词典》的词义划分问题	张可任 (123)
从台湾省编《中文大辞典》的几条 用例看资料的核对和利用问题	天 水 (133)

广古书疑义举例（三、四卷）·····	徐仁甫	（140）
词典学·····	〔苏联〕П. А. 布拉霍夫斯基	作（179）
	张在德 杨宗义	译
现存秦汉魏晋篆隶石刻表·····	无 闻	（206）

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

徐 中 舒

文字是人类进入高等文明所必需的工具。人类有了文字，才能够把这一时代人类的智慧和经验留给后一代人，作为他们继长增高的阶梯。没有文字的民族，总是会停留在象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，“复结绳而治之”的蒙昧阶段。

人类初有文字无不从象形文字入手。象形文字的发展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只是一种表意的图谱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记载：蜀汉时“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，谓之耆老，便为主论议，好譬喻物，谓之夷经。今南人言论，虽学者亦半引夷经”。此种夷经，乃古代夷族的图象文字。《南中志》说：“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，先画天、地、日、月、君长、城府，次画神龙，龙生夷及牛、马、羊，后画部主、吏、乘马、播盖、巡行安恤，又画牵羊负酒资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，夷甚重之。”蜀汉以后南中故事每每托言诸葛亮所为，皆属附会之谈，实不足信。此图谱乃夷人巫师所作，并非诸葛所赐。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，乃夷人对城府中的汉官指天地日月以为誓。其次画神龙，夷人自称为龙的子孙，龙为他们的图腾。最后画夷人牵羊负酒资金宝向汉官输诚，献纳贡赋。这种画象，只能表意，不是可以按字宣读的语言，只有巫师才能认识，还要多方譬喻解说，不然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。

汉语象形文字开始于殷商时代的后期。殷王朝自盘庚迁殷以后

就已形成一个疆域广阔的强大帝国。根据现在考古发掘资料，它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，东向越过渤海而到达辽东半岛，南向渡越长江而跨有洞庭波阳两湖地区，西向而臣服周王季和文王，囊括关中汉中。殷王要统治这样广大的土地和人民是不容易的。当然我们没有理由为他担心。当时殷王左右就有一班知识分子作为他的顾问——一个能作预言的前知者的卜人集团。

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必然就有几个脱离生产的公职人员，有的作为部族的信仰守护人，用祭享方式教导人民，虔诚地遵行先代的典章制度以及一切行之有效的成规，使部族从安定中得到发展。

占卜的贞人为人决疑问难，他们原是从占星师分化出来的一种方术之士。他们在狩猎时代就用火灼焦兽骨，观其坼纹，以占吉凶。后来殷人发展到长江流域，就把那里所产的大龟作为宝物。占卜中龟甲与兽骨并用，他们或者认为用大龟占卜比骨版更加灵验。占卜的方式也就更趋繁复，每卜必从正反两面贞问。一正一反，即为一兆。其文如卂，此字以后演变为𠄎。他们认为这些兆纹，向左向右的种种变化，都是宇宙中排列有序的象和数。如其说这样模糊的象数有什么灵验，毋宁说他们常在殷王左右，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取得一些自然变化和人事成败的道理，凭借殷王的权力，就可以使预言成为现实。占卜得到历代殷王的信任，其原因即在于此。

甲骨文字记载，从武丁到帝乙帝辛之世二百七十余年中，所有贞人，据陈梦家统计共有一百二十一人，而武丁时就有七十三人。其不见于甲骨文者，其数或当与此相等。这就是殷王朝庞大的贞人集团，可以说就是殷王的智囊团。他们为殷王占卜的事和以后的验辞，都要用文字记录下来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兆旁，既备殷王查考，也藉以取得各种象、数记录，传给下一代贞人。我国文字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。

第二阶段汉语文字的发展，当自殷代后期开始。殷墟甲骨文已

具备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四种造字条例，这是造字之本。象形是象自然物之形，如日月山水牛犬豕等字，只用简单笔画勾勒其形，最易识别。象事、《说文》称为指事，乃象人为的事物之形。如封字，其形，是植树为界而后加人为的土堆。卅是人行的十字道路。都是人类造成之事。又如一、二、三、𠄎，这些数目字，也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客观现实。又如兽作𤝵，干犬并列，乃人们从事狩猎的工具。过去学者解释指事，只从指字着想而忽略了大量的人事。勉强凑足很少几个字，都很牵强附会，所以这一条例，始终没有讲好。象意，《说文》称为会意。会意是在自然之物与人为之事，加上人的动作以表达人的意志。例如𡗗，表示人在路上走。如𡗗，表示人在用手持捶击磬。我们这样去理解，自然把象形、指事、会意三者分别得清清楚楚的了。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。它的产生，是由于象形字笔画简单，在长期使用中容易混淆，所以必须加声符以区别之。例如鸡和凤都是鸟形，后来各加声符，佳旁注奚为𪇑，佳旁注𠂔为𪇒。又如星，最初作晶、𠂔等形，与口日等字不易区别，后来加声符生为𠂔或星。甲骨文中形声字还居于少数，不如会意字多。以后形声字发展了，在《说文》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，这已经是隶定以后的事了。象形文字在创造时，只是随事赋形，随物赋形，并不困难。每个字都是独自发展的，人们要记住这些孤立的字是困难的。首先它必须在卜人集团中互相传习，反复使用，渐成定型，而在反复使用中，意义有所引申，即分化为数字，按义类分注于原字之旁，此即所谓转注。但引申意义过多分化，使用也不方便，于是用假借加以制约。凡声音相同或相近的，就不必另造新字。转注假借，二者乃是文字发展中辩证的统一，相辅相成的。

汉语文字原来就不是一两个人闭门创造发明的，最初它在卜人集团中传习使用，约定俗成，后来这些汉字在人民群众中推广使用，经过传写，隶定，讹变失真；而这些讹变失真的字，约定俗

成，也成为正字了。汉语文字根据六书条例，发展成为记录人类一切复杂事物的工具，但其系统仍是象形的。即使是形声字，也还是要借用字形来表达其音，而不必另制音符。所以汉字完全属于象形文字系统。汉字如果没有创制这些象形文字的贞人集团，文字就只能停留在原始阶段的图谱形状，如埃及，如巴比伦，又如我国云南的纳西以及《华阳国志》所说的夷经，他们的象形文字，终要为拼音所取代。据此言之，汉语象形文字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。首先是由于殷商后期有二百多年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；其次汉语文字按照六书条例沿袭象形文字体系前进。由商以迄于今三千年，一脉相承，自成为一种完整的体系，使我国光辉灿烂的文明在三千年前即已照耀于东亚大陆，这确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。

汉语文字从殷商时代以至东汉已历一千四百余年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掇拾于秦火之余，搜罗当时所存篆籀古文，共得九千余字，用科学方法分析每个字的形音义，阐明其字原和语原。他所根据的汉代的字书及战国古文，都是经过长期的转抄，字形几经变化。先是受甲文刀笔的影响，变圆为方，继由篆文隶定，往往又把字形相近的字互相混淆。郢书燕说，常亦有之。东汉时代经学大师今古兼治。许慎也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，穿凿附会，亦所难免。《说文》这些缺点，完全受时代的局限，瑕不掩瑜。这也是我们应当加以原谅的。

汉语古文字字形学，在北宋时，已开其端。以后古文字资料不断发现。尤以近八十年来，大量甲骨文字出土，经过许多文字学家的努力，汉字字形学的研究，已有长足的进展。所不足者，过去文字学研究者总是就字论字，旁征博引，冥搜孤讨，臆想居多，究非上乘。他们很少在字与字之间求出其对应关系，作出系统研究。如释史为从又持简，不知甲文史原作𠄎。𠄎，乃干戈之干的本字。古人狩猎作战，即以有枿槎的木棒作为武器，进则以侵犯人兽，退则以捍卫自身。𠄎从又持𠄎，古代人类，从事狩猎，取得食物，是当

时的大事。史之本义为事。文史之史，乃引申之义。丫为人类最初使用的武器。在枹槎两端捆上锋利的石器，则为𠂔。在枹槎之间捆上重量石块则为𠂔，为𠂔，在冲锋陷阵之中兼为捶击之用。故𠂔字省其枹槎，则为击中之中，借为伯仲之仲。中间之中，甲金文作𠂔，后人省𠂔为中，因而又别制仲字，而中则兼中间之中与击中之中两义。𠂔又为战争之战。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甲乙本三十一章，甲本作𠂔，乙本作𠂔，可证。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字联系在一起，就可以了解到丫𠂔之原义，而这些汉字的字原和语原，不待多说，也就不会使人误解了。我们认为这样研究古文字，古文字学就可以逐渐进入科学的坦途了。

汉语古文字字形表，是为我们编纂汉语大字典所作的准备工作。我们要求了解汉字的字原和语原，是编汉语字典的首要工作；这个工作必须从整理古文字字形入手。这部字表的甲、金文字的取材，主要参考《甲骨文编》和《金文编》，我们保留其中所有不同的典型形体，其与典型形体相同的，则删节之，以清眉目。《金文编》未录的新出土铜器，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，以及战国简书帛书、侯马盟书，我们也分别加以采录。对前书有不同的解释，则加以改正。此外，战国时代的印玺文字、货币文字及匋文，其形、音、义及出土情况，我们弄不清楚的，则概不采用。《甲骨文编》、《金文编》的附录及正编中音义不详的字也未采用。这个表是古文字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总结。由于编辑时间仓卒，还有很多遗漏或错误。这个字形表，只是为《汉语大字典》的编写服务，不是研究全部古文字的书。以后我们准备对字形表中的字加以系统的考释，另外还想把一些不能认识的字，根据偏旁分类排在一起，作为附录。这样就可以在大字典以外另成一部专书。这个字形表中，有些不当的地方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九八零年八月

《汉语大字典》

为什么还要用旧笔形的繁体字

冉友乔

《汉语大字典》前几次的编写方案，因只收楷体字，曾规定用简化汉字作字头，下面再列繁体，没有简化的当然只用繁体字。后来要求加上甲、金、篆、隶，要尽可能反映汉字的发展变化，就只好用繁体字作字头，简化字作为正字放在后面。又遇着一个问题，是用旧笔形的繁体字呢，还是用简化类推新笔形的办法把几万个汉字加以改造？从四个方面谈我的看法。

（一）文字的社会性 语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，是人们用它来交际交流思想，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。记录语言的文字，也同样具有社会性。语言只能规范化，不能一下子搞出人造语种；文字是可以创造，可以改革的，但要约定俗成，还得承认文字的历史事实。拿汉字来说，甲、金、篆、隶、楷书、简化字都是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，它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的。历代读书的人，从他开始识字时起，当时通行的文字，就必须首先学习。如果要汲取古人记下来的文化知识，还要认识过去行使过的文字，确实很麻烦，因而历代都有整理文字的事。大家知道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为了“书同文”便命李斯等以秦人习用的籀文为基础，“或颇省改”，并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”，于是就成为小篆。同时又使用隶书，“以趋约易”。东汉时隶书已盛行了，但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仍以

小篆为正体，同字头下列上流传人间的籀文和古文，说解则用隶书。从汉石经到清代刻的石经，为读经立字样，都进行过正字工作。其它韵书、字书，尽管体系不同，也起了收字正字的作用。唐代楷书盛行，颜元孙在《干禄字书》的自序里说：“字书源流，起于上古，自改篆行隶，渐失本真。若总据《说文》，则下笔多碍。当去泰去甚，使轻重合宜。”“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，具言俗、正、通三体”。例如，上声的断、𪛗、斷三字，指出上俗、中通、下正。又在禮、礼二字下指出并正，多行上字。他能够重视文字实际，不完全根据《说文》，不排斥俗字，对约定俗成，即对文字的社会性，可说是有所认识的。近代编写的《康熙字典》是总结前人经验，整理楷书汉字的一部大型字书。《中华大字典》在体例上有所改进，对汉字的笔画和笔形又作了一次清理。有一条凡例中说：“字画宜归一律，庶音义不致紊乱，如匚匚异部，夾夾殊音，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”。可见旧笔形繁体楷书汉字是一千多年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，是历史的客观存在，一笔抹去，行吗？

（二）《汉语大字典》的性质和任务 这部字典是古今楷书汉字的大汇编。编字典必须继承前人已有的成果，正确可靠的东西都要汲取，这就理所当然的要在《康熙字典》和《中华大字典》等书的基础上进行审查整理，对过去使用频率高而被排斥的俗字，传世重要典籍上的不常见字，行之已久而运用区域较广的少数方言字，也要酌收。总之，是字典，不是字库，估计约六万字左右。根据“古今兼收，源流并重”的要求和原则，在字形方面，上列甲、金、篆、隶，下收今天通行的简化汉字，力求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的发展变化，中间独缺行使一千多年的旧笔形繁体楷书汉字，行吗？

（三）为读者着想 现存绝大多数记载古代文化的书籍都是用的楷书，自北宋木刻书盛行以来，旧笔形繁体楷书汉字虽仍有各种差异，但已比较稳定。楷书的特点，总是由点、横、直、撇、捺

等笔画所构成。编大型字典就需要整理形体，清理笔画，清理笔形，否则六万左右的方块字就难于处理好。如尢与木，𣎵与林，禾与禾，丰与丰，𦰩与𦰩，𦰩与𦰩，陕与陕，崇与崇，本与本，市与市，等等，稍有差异，便成为另一个字，遇上笔画多的字就更难办。如果用新笔形无限制地加以类推，必然会造出大量从来未使用过的怪字，即令附上旧笔形，既增加篇幅，也增加读者的麻烦，如不字字新旧对照，碰上生僻字在形体上就对不上号。读者之所以要查阅字典，总是由于不知某个字的读法、讲法和用法。解决不了这些问题，还得去求教《康熙字典》或《中华大字典》，那又何必再编这部《汉语大字典》呢！

（四）历史唯物主义地贯彻执行文字改革的方向 前面已谈过，汉字源远流长，由篆到楷，几经递变，但仍属于表意的而非表音韵。演变的结果，使象形字形既不象，形声字声也不谐，加以形体复杂，字数太多，难认难写，耗神费时，成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一大障碍。为了便于运用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：“文字必须改革，要走出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。”建国以来，根据汉字总是避繁就简的趋势，公布《汉字简化方案》，制订和推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，推广普通话，都是为实现汉字的拼音化积极准备条件。

《简化字总表》中的字，是为了减少笔画，是解放后的新字，当一律收入正文。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是为了既减少笔画，又减少字数，以利目前运用，与从形体演变来整理异体字的目的要求也不同，当列成附表，否则形、音、义三者的相互关系更混杂，更难简明恰当地处理了。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》也专载在字典后面，不搞偏旁类推。这是因为《汉语大字典》受了体例的限制，只收单字（词），不收复合词，收联绵字和音译外来词，也主要是为了存音。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多，现代汉语复合词多，从这个角度讲，《汉语大字典》已注定是“厚古薄今”的，怎么办？用不用新

笔形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，规定的新笔形只有几千个字，现已通行，一般常用字典和词典也在应用，有利于今，这很好。收几万个大字典，不类推新笔形，保留原样，并非崇古，也不要求人手一册。由于实际情况不同，目的要求不同，应允许处理各异，以起相辅相成的作用。我常想，我们今天正进行文字改革，创造条件搞汉字拼音化，为什么还要不少人去研究乌龟壳、青铜器、竹简、帛书，将来汉语用拼音文字了，还要不要读旧笔形繁体楷字的书，还要不要一些人去研究汉字。现在不编这一类型的书，后人要进行阅读、研究、只好用康熙时代或民国初年编的字典，当然，还可以在日本人那里去拿，反正是汉字，物归原主嘛！

总之，我认为不应当制造大批不古不今的假古董，应当如实地反映汉字发展变化的本来面目，这就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，就是在为活人编字典，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。

根据上述情况，我认为《汉语大字典》所用的繁体楷字仍应用清理过的旧笔形。

甲骨文字的一字多形问题

——《甲骨文字典》编纂小组工作笔记之一

《甲骨文字典》编纂小组

汉语的文字是古代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，根据实际需要而创造出来的。由许多人或集团所创行的字，本来是形体各异，音义不一的，但在长期使用过程中，通过约定俗成逐渐得到社会的公认。于是某些字被淘汰，某些字得以继续使用流传，并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发展。在殷代奴隶制社会中，由于文字的使用是由统治阶级所垄断，所以使文字的发展一方面是受到局限，另一方面也还是有利于文字逐渐走向初步的统一，这对于文字的流传与发展都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在整个殷代，卜史人员众多，他们对文字的创造与使用，因师承之不一，理论主张之各异，风格、手法、习惯之有别，必然使甲骨文字在便于通用的大同之中，还要出现小异。所以今天人们在接触到甲骨文字之后，首先就会感到字形还很很不统一。这种字形的差别，如果仅限于偏旁增省，部位方向的不拘，笔画虚实繁简的不定，还不影响对甲骨文字的辨识，而最困难的则是甲骨文字的一字多形问题。在甲骨文字中有很多的字，是代表同一的音与义的概念，而其形体则几乎完全不同。异体字较多应该是甲骨文字的特点之一。徐中舒老师总结的这项原则，使我们在学习或研究甲骨文字中，打开了思路，扩大了眼界，因而在编纂《甲骨文字典》中也取得了进展。下面把我们小组在工作和学习中的一点体会谈一谈，敬请指正！

一、一字多形的出现是由于本字与省形字经过讹变后发生分化——释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。

《说文》：“祀，祭无已也；从示，已声；禋、祀，或从異。”许氏认为这是形声字，形符“示”训为“神事也，表示泛称神事的意类，并没有说是专指“祭”的含义；而声符“已”是声兼意的，段玉裁对许慎训“已、已也”解释为即“已然、已止之‘已’”，认为是以反训“无已”表示“已”的含义，这里也没有说明从“已”声为什么竟然是“祭”之无已。“已”和“祭”究竟有什么关系。《说文》在“祭”字条下只是说“祭、祭祀也，”与已然、已止之“已”并无牵涉。以“已”为声的“祀”字与“祭”字是否互训，而“已”字是否应该训“祭”，《尔雅释诂》虽然释“祀，祭也”，但这在《说文》里是不明确的，然而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在释读卜辞中产生的分歧也将难以断定孰是孰非的。

《殷契粹编》第1113片“殷贞，我勿已旁，乍帝降不若”等辞的“已旁”，考释“旁”为贞人名旁者，“已”训为止，“已旁者盖谓罢免其官职”，同时否定其“旧解为宾祀之事不确”。究竟这种新的解释是否正确，还是应当从大量卜辞中进行检验。

卜辞中的“已”作“𠄎”与作“𠄎”的“祀”字都应训为“祭”。“祭”字在卜辞中多以“祭于且乙”（库1032）或“祭上甲”（续1.5.1）等祭先公先王之类的句型出现。而“祀”字则为“祀于父乙”（陈42）；“祀且乙”（存1.257）等。至于“王旁××（先公、先王名）祭”的句型，在“祀”字的句例中，便是在“旁”字下省略先公先王名，作“旁已”（粹1117），或更省略为“王祀”（粹42-8）或“王已”（明151）的形式。如果把“已”、“祀”、“祭”三组卜辞材料进行综合比较，可以看出“已”与“祀”仅有字形上繁省之别，其含义与“祭”字是一致的。特别是联系与“旁”字有关的卜辞作“王旁𠄎（祭名）”（前4.31.1），“王旁𠄎（𠄎）”（明12.2），或“王旁翌日”（丙31）

等看来，“𠂔”字是同祭名紧密相连的。说明“𠂔”即是“侯”，而“巳”也是一种祭祀活动，“𠂔巳”即“侯祀”。可见“巳”的本义为“祭”，而已止之巳则是引申义，《粹编》的新释并不可靠。

“巳”就是“祀”的初形，训为祭，这还可以从“巳”字的形体结构上找到根据。原来“巳”字乃是“異”字的省形，这种看法乍提出来，也许使人不容易接受，但是经过剖析之后，人们便会发现《说文》“禋、祀，或从異”是有道理的，是符合历史实际的，它给通读有关的卜辞找到了钥匙，因而是值得重视的。

段玉裁在《说文》这一条之下注为“古文‘巳’声‘異’声同在一部，故异形而同字也。”这两个字古音同属喻纽，之部与职部二韵也是相通的。今音对喻纽与审纽字虽有差别而古音则是相同，这正如似与以今读虽不同，而古音则同，《易·明夷》“文王以之”释文作“文王似之”；《说文》倡（似）从目（以）声，《尔雅·释诂》“弛，易也”，以易声训弛。此外在字义方面，从卜辞中更可以得到充分的例证。

卜辞中的“異”字作“𠂔”，多以“王異”的句型出现，用法与“王祀”“王巳”相同，如：

辛丑卜彭贞：翌日壬王異，其田盥湄日无𠂔？（佚277）

壬王異，孟田弗（甲394）

王異，田亡大雨。（入1989）

贞，王異（文605）

王異（佚408）

“異”字在卜辞中或作“𠂔”、“𠂔”形如：

庚戌卜夬贞：不其雨，帝（禘）異。（续4.3.7）

口申卜贞：異，佳其不雨。（前6.56.7）

丙子卜癸贞：父乙異，佳𠂔王。（乙7705）

在上述例句为代表的卜辞中，“異”都应读为“祀”，特别是

根据同版对贞卜辞更可得到确证。如在《甲编》第3915号龟版中，其上右一卜为“甲子卜烧贞：王巽，其田亡咎？”而其左侧则为“甲子卜烧贞：王勿已：田。”充分说明了卜辞中的“巽”与“已”只是字形有异，而其声与义则是完全相同的。

“巽”字，李孝定释为“翌”。由于“巽”（即已、祀）与“翌”都含有“祭”义，当然可以读通一些卜辞的。只是在遇到上举“贞：翌日壬，王巽”一条时，便不能不承认“‘王巽’之前固已明言‘翌日壬’矣，如下‘巽’字亦解为明日，语意未免重复。然则此辞‘王巽’之巽或有别解，盖尝苦思而未得其故也”。（《甲骨文集释》页814）其实，只要据《说文》之“祀，或从巽”，验之卜辞，释读为“祀”即可“得其故也”。

“巽”即“已”字，不仅是古音相同，卜辞文例相同，而且在字形结构方面也是有根据的。

卜辞中的“巽”字还有作“𠄎、𠄏”形的，皆见于一期卜辞，应该是“巽”字的较早形态，也读为“已”。关于这个字，李孝定由于解释“巽”字时认为“巽，戴也。象人首戴𠄎之形，从𠄎、从𠄏，𠄏亦声”（《甲骨文集释》页808），便对丁山释此字“以为巽字，说有可商”。因为他认为此字“乃象人抱子加之肩之上形，非象戴物也。”只有戴𠄎才是戴，戴子则不应为戴，此字既属戴子，便不与由戴𠄎而构形之“巽”字相同，因而李氏对于“𠄎”字的探讨便无法继续下去。

于省吾先生在《考古》1979年第4期发表《释𠄎》一文，把有关的甲、金文做了分类整理，为解释有关的字提供了条件。在归纳的五类字形中，以“𠄎、𠄏、𠄐”三字为代表，隶定为“𠄎、𠄏、𠄐”详加论证。认为“𠄎”字“旧或误认为巽”不确，“𠄎和𠄏均系古文举字，𠄎为凡举之通称，象举手形。作𠄏象举手形，为𠄎的孳乳字，作𠄐象举手于床上之形。”解释举“不外乎抚育幼穉之义”。仔细阅读之后，使人有一点不明：既然𠄎为初文，本义当出